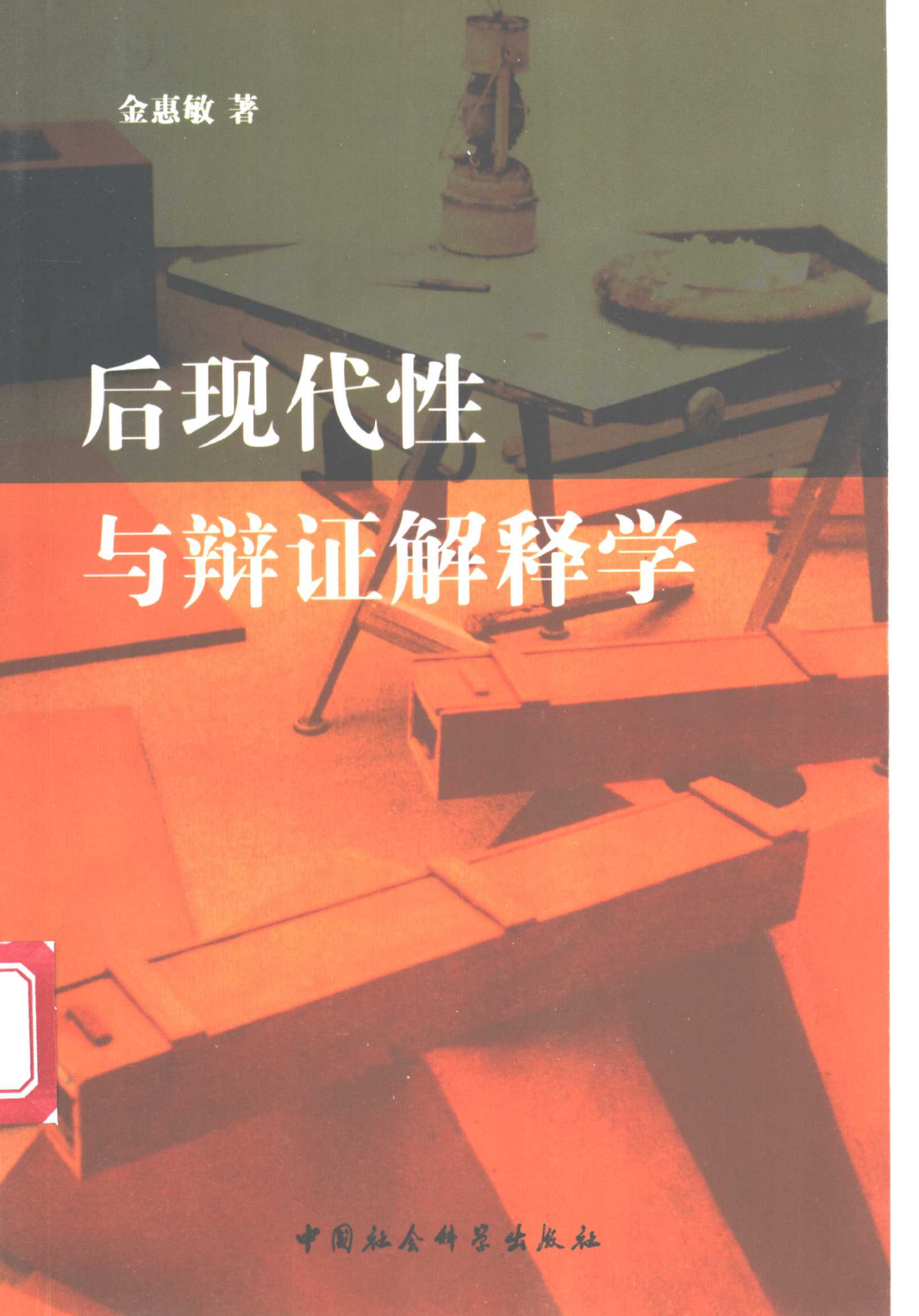




金惠敏 著

后现代性 与辩证解释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惠敏 著

后现代性 与辩证解释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金惠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004-3591-6

I. 后… II. 金… III. 解释学—研究—德国
IV. B08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327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师若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15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汝 信

记得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世上有许多东西都随着时尚而变化，从思想一直到女士的裙子。且不论他这么说用意何在，他说的倒确乎是事实。近几十年来，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此相应，西方思想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流派。传统的观念、理论乃至思维方式受到猛烈的批判和冲击，人们企望思想上的创新，寻求理论突破以完成这样或那样的“转向”或“超越”。在这弃旧图新的思想浪潮中，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无疑是当代西方思想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哲学界可以说是言人人殊，并没有一致公认的看法。人们不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而且对它的评价更相差甚远。从前些年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热烈论争，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意见分歧如何严重，当时很多知名人物都卷入了这场论争，而像哈贝马斯那样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是坚决拒斥后现代主义的。实际上，被人们归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那些当代西方哲学家虽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却各有不同的哲学主张，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和思潮。这就更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难。因此，对于后现代主义那样的西方思想发展中

的新现象，需要从第一手资料入手进行认真扎实的研究，并结合西方社会的实际进行深入思考，然后才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切忌抱有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贸然地匆忙下结论。金惠敏同志近年来一直潜心于研究后现代主义，攻读和钻研了大量有关著作和文献，颇有心得体会，深得个中三昧。他的近著《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并不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专著，而是用后现代的新的视野去重新审视一些问题，正如他在该书“导言”中所说：“既然后现代主义已经来临，那么在有了后现代主义之后我们就必须把传统的论题置放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这并不是……为了‘弄潮’，赶时髦，因为后现代性已经向现代性挑战。”这是一种大胆的新探索。在本书中，作者以崭新的视角去细致地考察和探讨一些他感兴趣的传统论题，如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和孔子的仁学，新意迭出，有不少创见，扩展了原有的研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当然，在学术问题上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本书中提出的看法乃至作者所采用的方法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我倒希望学术界能就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或争鸣，对于推动我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再没有比充分自由的讨论更重要的了。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需要一提，那就是书中第四编作者和一些西方后现代理论家的对话。在过去，我国学者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大都是以自己的观点来进行介绍或批判，缺乏与对方的对话和沟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走出国门，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大为增加，通过频繁的学术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改变了过去那种互不往来、各说各的状况。但应该承认，真正的思想交流和较深层次的学术对话尚不多见。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有些青年学者已在这方面努力迈进了一步。我所以欣赏本书第四编，就是因为作者在那里以平等的身份与一些知名的西方学者真正进行了

一场学术对话，对话很专业，有深度，也有交锋。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须认真对待，讲求实效而不做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时代进入了 21 世纪，中国学术要真正走向世界，就不能满足于自我欣赏的独白，而需要和外部世界广泛地开展对话，在对话中坚持自己、发展自己、丰富自己。我以为这是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经之路。

导 言

我并未将后现代主义只是当作一种思潮，那需要广义文化的研究、社会学的考察，以及情报学的跟踪。我不否认其思潮性，尽管作为思潮它仍在汹涌澎湃，我更看重的是其思想性，看重它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理念对于传统人文学科及其基本信仰的挑战。要有力地、有成效地回应后现代性借助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急功近利的、哗众取宠的、弄潮儿的做法至多只能激起几朵美丽而转瞬即逝的浪花。它需要的是扎实的文献研究，耐心的社会体察，痛苦的思想否定，在此基础上或许能够产生一些有深度的、有创新理论结论。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结论，包括我在本书中所得到的结论，有多么的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如何地逐渐走向这些结论的。例如看山归来，重要的不是一句“那山真好”，而是游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您的起伏变化着的感受。时下学术刊物的“内容提要”，实际上只是一个导引，而不是全文内容的浓缩，那种信奉再现性或代表性、过去叫典型性的意识形态已经乏有问津，一切都是修辞，都是比喻，都是比喻性的暗示，都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故此我在本书将“内容提要”改为“阅读提示”，它只是提示、导引、显现，而不是本体。“阅读提示”不能替代阅读本身，但每章安排这样一个“提示”，也许会给读者对于这种沉湎

于个人思维的文本以一个局外而“览小”的视角。

最近一位做东亚研究的美国学者在访问北京时提请中国学者注意一下后现代思潮，因为他认为未来十年人文学科将因后现代思想而发生一场革命。东亚学在美国是个边缘学科。其实这种学术革命即使在中国早就已经发生过了，话语、霸权、意识形态、叙述、他者、差异、边缘、游牧、对话、越界、互文、修辞……这些后现代概念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学术用语，只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或意识到而不愿承认罢了，自然这其中有着一言难尽的隐曲。

我本人不能算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坚持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性对于我们学术事业的重要性。既然后现代主义已经来临，那么在有了后现代主义之后我们就必须把传统的论题置放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这并不是，恕我重复，为了“弄潮”，赶时髦，因为后现代性已经向现代性挑战，尽管有时庄重，有时谐谑，或者亦庄亦谐，——但这只是一个表达形式问题，毕竟掩饰不住其内在的使命冲动，哲学的以至于政治的。

既然后现代主义除了作为思潮之外还是或者更是思想，是后现代性，既然它已经不拘形式地向我们表现为现代性的基本信念下了战书，那么在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就有了自然而然的联结。

这联结就是我在本书的出发点和方法论，简单地说，我是在传统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辩证解释学”的工作，这工作就是寻找二者之间的对话，找到其同、其异，让同成为我们可以分享的成果，让异继续保持其异，成为与同构成张力的对于思想和理论的魅力。是或谓之“求同存异”，但“存”决不当是消极意义上的“存而不论”之“存”，而是积极的有独立向度的生存意志，茁壮英发、自在自为。

我以后现代视角徜徉于三大思想传统之间。在德国思想中我被告知人及其理性应当是什么，法国理论则经常说人不是什么，还

有超出于人的，而中国思想的博大雄浑，则似乎是一切思想永远跳不出去的如来手心。我终于不再犹豫，思想包括其形式的差异决不同时就是思想及其形式的优劣。

作为一项学术工程，本书必须限定自己的论题。在德国方面我重点解剖了现代解释学创立者施莱尔马赫的现代性和解构性，在中国则试图激活孔夫子的主体性与他者性思想。当然，最令人震撼的是法国列维纳斯的“无限的他者”，就连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都表示，“列维纳斯的思想能够使我们发抖”。

本书第四篇是一组访谈对话，访谈是形式，对话是追求。它构成了本书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谈话的主题仍是前三篇的主题：主体性，他者性，现代性，言不尽意，无物之词，等等。这不应理解为只是对前面内容的补充、丰富，我实际上更着意的是将之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基本的学术方法，就是不仅要有“学”，要有“思”，还要有“问”，——这“问”是智性的操练，只有“问”才能使“思”和“学”活跃起来。夫子曰：“大哉问！”（《论语·八佾》）这“问”既是某一问题之“问”，也是抽象之问，是问之行为本身。学问学问，学乃在于问。这就是辩证解释学，即通过对话而达到理解。我们已经具备了“问”的条件，关键是能否积极地做下去。

本书是一纯粹之学术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但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逐渐形成一个与历史主义意趣相反的看法，历史主义说一切思想都是思想史，而我想说，一切思想史都是思想。思想史的研究不是为了考古学的复原，那诚然可以满足人们的历史兴趣，而是为了发现它与今日现实的动态性对话关系。紧要的不是它曾经是历史的，而是它仍然活着，或者随时都可能复活过来。一切能够引发我们兴趣的思想都一定有着现实性，在我们兴趣之外的思想或可能有着将来的现实性。一切有成就的思想都是

一个思想个体，不可取代，不可简约，只可以忽略，留待别人去发现。宣布某一思想的死亡只是意味着一种态度，至多代表着现在，但不完全的现在，因为它永远不能穷尽他人和未来。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历史的烟云触处即散，我之所见都是思想，纯净得透明的思想。清灯孤卷，它给了我那么多的欢喜、激动、狂乱，从那纵横的沟沟壑壑以及沟壑里的尘埃浮现出她美丽的嫣然一笑。我理解了屈原为什么喜用美人香草，但丁为什么请贝亚德丽采作天堂的向导，我也理解了柏拉图为什么见到美的理念便不能自持。美与神圣一体！

在西方，后现代目前有向现代妥协的趋向，当年福山宣布“历史终结论”时的得意和狂妄和我们左翼的不屑、不快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不过，在中国后现代主义从输入的那天起，就是为了论证现代性的合法性。“启蒙的计划”如果说在西方尚未完成的话，那么在中国至多只能是刚刚起步。在西方启蒙计划之尚未完成意味着“启蒙”的“辩证法”，是过度“启蒙”所带来的副作用，是吁求回到“启蒙”，而在中国启蒙之刚刚起步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现代性，而且同时还不能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在现代性刚刚起步阶段即遭遇西方的后现代性，这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后现代性的时空错位和因之的尴尬，但实质上是它面临着双重的使命：启蒙，与对过度启蒙的校正。在西方只要“启蒙的计划”尚在实施，在中国只要它已经起步，不再回头，那么后现代性便不会失去其作为批判性的存在价值。

当然这绝不是说后现代性仅仅意味着否定性。把后现代仅仅作为否定性一方面是由于为后现代文化之现象所一叶障目，另一方面则出自一个更深层的对于现代性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化的理解。“启蒙的计划”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计划”，它是“计划着”，而不是“已经计划便不再需要计划”，是一个在其实施中需

要不断接受修正的动态的计划。如果说现代性在进行中接受了后现代性的批判而对原计划做出修正的话，那么这修正应该就是后现代性的肯定性成果。

在别处，我们已经看到了“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例如在美国的现代神学家、哲学家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的著述中，再例如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复例如孔夫子以前现代而后现代的“仁”学。当然对于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建构性后现代，我只能简单地回答说，是对已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超越。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这不是搪塞，我不想将后现代性形而上学化，如哈贝马斯已经对现代性所施行的那样的手术。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乌托邦这一点上没有分歧，激进者如德里达也是承认的，我认为，这恐怕是一切思想或人文学科的终极之光。我们怀有美好的梦想，但这梦想是有差异的，实现这梦想的方案和过程将差异更甚。

面对差异我们需要胸怀和宽阔的前额。我理解，即便从物理上说，这也有一个过程，何况思想呢？！

默默的，让我们把敬意留予耐心。

目 录

序.....	汝 信(1)
--------	--------

导言.....	(1)
---------	-----

第一编 后现代性与德国解释学

第一章 现代解释学基础

——论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现代之维.....	(3)
-----------------------	-----

第二章 在言词与意义之间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解构之维	(31)
-----------------------	------

第三章 方法与反方法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猜悟及辩证	(53)
------------------------	------

第二编 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思想

第四章 孔子思想与主体性问题	(77)
----------------------	------

第五章 孔子仁学的反本体论性质.....	(109)
----------------------	-------

第六章 尼采与中国的现代性.....	(128)
--------------------	-------

第三编 后现代“帝国”的扩张

- 第七章 无限的他者：列维纳斯的形而上学…………… (153)
- 第八章 后现代“帝国”：一个正在扩张的版图 …………… (173)
- 第九章 理论旅行：中国后现代主义悖论…………… (185)

第四编 后现代理论家如是说

- 第十章 在虚构与想象中越界
——沃尔夫冈·伊瑟尔如是说…………… (195)
- 第十一章 从主体性到他者性
——盖布里埃乐·施瓦布如是说…………… (212)
- 第十二章 永远的修辞性阅读
——J. 希利斯·米勒如是说 …………… (232)
- 第十三章 无物之词
——马克·波斯特尔如是说…………… (245)
- 后记…………… (263)

第 一 编

后现代性与德国解释学

第一章

现代解释学基础

——论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现代之维

阅读提示：本章论述了施莱尔马赫解释学在 19 世纪科学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语境中的生成，解决了我们应当在怎样的意义上称其为“现代解释学之父”。这为目前我们讨论哲学的现代性而非哲学与现代性以及具有悠久的注经传统的中国建立现代理论解释学提供了一个案性的启导框架。

1981 年 4 月。巴黎歌德学院。在菲利浦·富热（Philippe Forget）教授善意筹划的“文体与解释”国际研讨会上，作为 60 年代以来欧陆哲学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派德国解释学与法国解构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与德里达首次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尽管认真的学者坚决否认在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交锋——的确他们只是讲了一些互不相干的话，简单地提了几个问题，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德里达根本就缺乏对话的诚意，于是伽达默尔便成了一厢情愿，但是我却宁愿将此作为一个对德国解释学和法国解构论展开比较研究的一个契机，而不去计较富热教授的蓄意策划是否获得了预想的成功。

德国解释学与法国解构论间的恩恩怨怨是一宗错综复杂的案件。当年，曾经主持过巴黎“峰会”的德国著名学者曼夫雷德·

弗兰克 (Manfred Frank) 教授在事隔 18 年后的 1999 年仍对解构论余怒未消——他在给我的一份电子邮件中声称：“我对后现代主义岂止是怀疑，而是简直不能忍受！我决不容许诸如解构、他者之流的术语出现在我的课坊或学生论文之中。”这里他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包括了德里达的解构论，而不像利奥塔和杰姆逊为标新立异自己的理论旗号而别有用心地将后结构主义从后现代主义中排挤出去那样。多年以来德里达似乎从未认真地对待过德国解释学：1998 年 5 月我在德里达的课间询问他是否写作过关于德国解释学的论文，他肯定地说：“没有，没有！”这种对于德国解释学傲慢的、不屑一顾的态度可能是激怒德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情感方面的原因。他对德国解释学的批评多是漫不经心的，但每一次又总是极尽挖苦。在那次会议上，他以提问的形式责难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未能认识到情感矛盾、权力、冲突、否定和抑制等对于阅读和理解的决定性作用；在关于尼采风格的一篇论文中，他数次轻蔑地提及解释学，因为在他看来所谓“解释学”在词义上就是说试图抓住“文本的正确的意义”^①，它先入为主地即在“解释”活动展开之前就咬定文本之内隐藏着确定的和自在的意义，且这一意义似乎只是作者方面的隐秘意图，而解释学的任务不过是尽可能准确地复现这一意义。^②与此相反，德里达根本就不承认意义的确定性甚至意义本身，他的“la question de la femme”一语表明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确定性对立，“哲学确定性”概念早已饥毙路旁。^③我们既不能确知每个词句的意义，也无法把握文本整体的意义。文本的自由嬉戏 (jeu) 即缺乏确定意义的能指的永无止境的运动使阅读不再是传统上以求真为旨归的解读，而成了随心所欲的或滑稽模仿性的活动。解释学家被一次次地撩拨又一次次地被挫败——这就是由文本所牢牢控制的解释学家在劫难逃的职业宿命。